

Macerata
Rome

Rome

Societas Iesu, S.I.

India

Goa

大西洋耶穌會士利瑪竇



MATTHEVS RICCIUS MACERAT.
of the Society of Iesus, the first propagator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in the Kingdom of China.

Macau

Zhaoqing

Shaozhou

China

Nanch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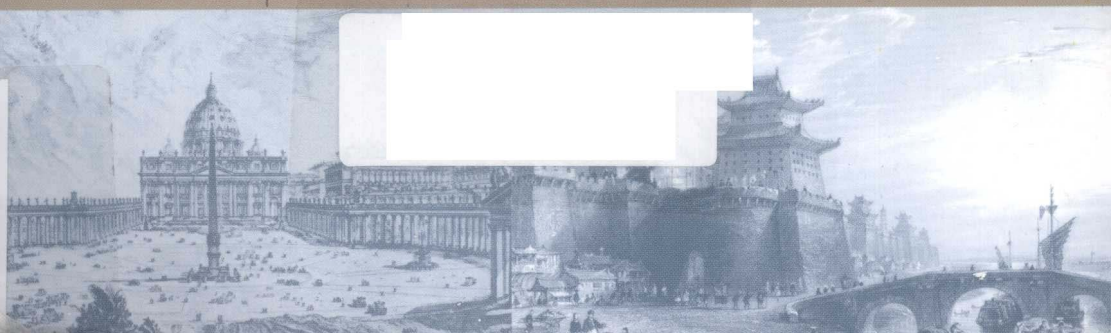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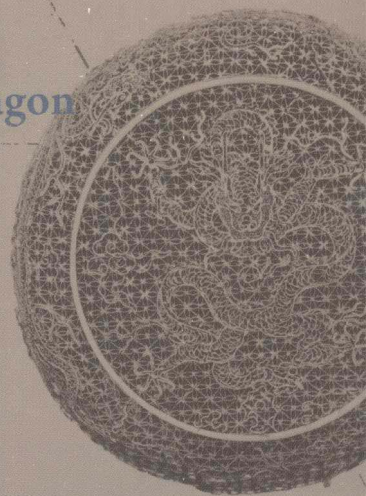
Beijing

当利玛窦遭遇中国

MATTEO RICCI
The Cross and The Dragon

江志文 / 著

紫禁城出版社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利玛窦遭遇中国/江志文著.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2009.4

ISBN 978-7-80047-571-9

I. 当… II. 江…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15422 号

著 者	江志文
责任编辑	何笑聪
装帧设计	IVYMARKTYPDesign
出版发行	紫禁城出版社
	地址 北京东城区景山前街4号 邮编 100009
	电话 010-85117378 010-85117596 传真 010-65129479
	邮箱 ggzjc@vip.sohu.com
印 刷	保定市中国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毫米 1/16
印 张	19.25
字 数	175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一版
	2009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047-571-9
定 价	68.00 元

Macerata
Rome

Rome

Societas Iesu, S.I.

India

Clea

大西洋耶穌會士利瑪竇



MATTHEVS RICCIUS MACERAT.
of the Society of Iesus, the first propagator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in the Kingdom of China.

Macau

Zhaoqing

Shaozhou

China

Nancha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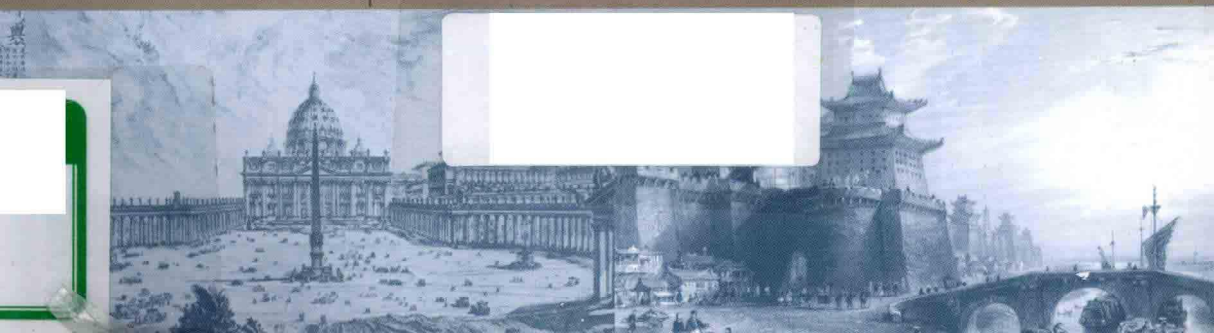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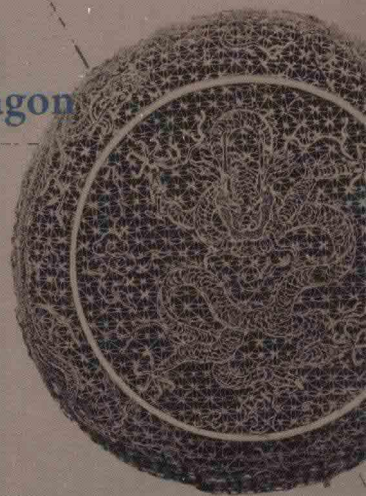
Beijing

当利玛窦遭遇中国

MATTEO RICCI
The Cross and The Dragon

江志文 / 著

紫禁城出版社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故宫出版

当利玛窦遭遇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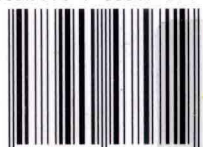
MATTEO RICCI The Cross and The Dragon

……在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利玛窦，一个是历史上真实的利玛窦，一个是艺术再现后的利玛窦。两个利玛窦并行不悖，从某种意义上讲，后一个利玛窦是前一个利玛窦的升华，他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思考空间。

如果从利玛窦1582年来华算起，四百多年已经过去了，如今中西文化交流正在成为一种潮流，回顾利玛窦其人其事，自然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

——前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 当代明史专家王天有

ISBN 978-7-80047-571-9



9 787800 475719 >

定价：68.00元

中华

B979.9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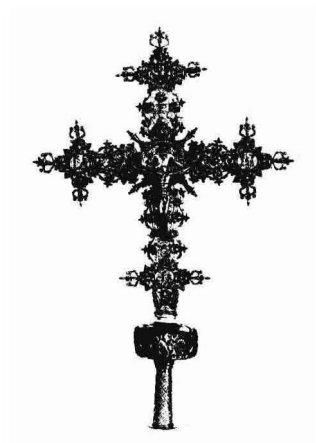
当利玛窦遭遇中国

Matteo Ricci

The Cross and The Dragon

江志文 / 著

紫禁城出版社



*
十六世纪中期西班牙天主教仪仗的纯银十字架杖首。上雕有耶稣生平的主要圣迹。此件现藏美国圣路易士博物馆。



·陈元后墓出土之花丝镂空金盒盖顶，钐刻的纹饰为五爪盘龙。北京定陵出土，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序

王天有*

江志文先生创作的《当利玛窦遭遇中国》即将付梓,拜读之后,启发弘多。

江志文先生在香港长期从事影视出版等文化工作。我和他认识是几年前的事,那时他正在和内地的一些学者编纂一套有关中华文明发展历史的图册,其制作之富于创意及严谨不苟,颇令我惊叹。此书目前尚未出版,现在还在反复地修订之中,要搞成精品。我为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探究精神而感动。前些年,他和陈赞明等先生登门来访,要我对他创作的电影剧本 Matteo Ricci (利玛窦) 的初稿提些建议,从此我们交往逐渐多了起来,他来北京我们每每都要见面,我去香港讲学,闲暇时也常常一起交流。在交谈中,我了解到江先生早年在海外就读中学及大学,以后又长期生活在香港,对中外文化交流具有浓厚的兴趣。在意大利著名制片家马里奥·各东尼的影响下,他选择了利玛窦这个人物作为中西文化的一个交汇点,加以研究,并且用形象化的方式加以再现,无疑具有深邃的眼光。

我个人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中外文化交流一直延绵不绝,其

* 王天有,前北京大学历史系系主任,当代明史专家。

中晚明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会士带入中土的“西学”，影响“至深且巨”。利玛窦是意大利传教士，他为了在中国传播西学便利，按中国习俗自号大西域山人、西泰、清泰、西江，中国士人则多尊称他“利公”、“利子”、“利先生”。当时的“西学”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传播天主教，二是介绍西方文化和科学技术。西学能够在晚明进入中土并迅速传播，从中国看有三个原因。

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海纳百川的相容性。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佛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域外文化都曾先后传入中国，并与中国社会融合。晚明天主教进入中土的规模和影响不低于以上异质文化的传入。虽然当时指天主教为“邪教”者大有人在，但是晚明社会文化的多元走向，为天主教传布提供了契机。

二，晚明社会也是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记》等科技名著，反映了明朝士人的科学技术水准并不低，西方传教士以科学技术为突破口进入中国，适应了明朝对科学技术发展的需求。

三，是当时有一批重实学的学者看到天主教教义与儒家传统思想有互补之处。他们都不同程度认为西方科学技术有为我所用的可能，推波助澜，加以提倡，其中不乏朝中显要。如叶向高就是万历时的内阁首辅，他有诗写道：“天地信无垠，小智安足拟。爰有西方人，来自八万里。言慕中华风，深契吾儒理。著书多格言，结交皆贤士。淑诡良不矜，熙攘乃所鄙。圣化被九垓，殊良表同轨。于儒徒管窥，达观自一视。我亦与之游，冷然得深旨。”明神宗朱翊钧、明思宗朱由检，以及不少皇族成员对西学、西洋物事也有浓厚的兴趣。

正是这三方面原因，明朝从总体上说敞开了西学进入中土的大门。

从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会士看，虽然他们到中国来的初衷是为了复兴在欧洲逐渐失去影响力的天主教，力求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但是他们毕竟从明朝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了一条学术传教路线：“在政治上拥护贵族统治，在学术上要有高水准，在生活上要灵活适应中

国的风土人情。”于是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在晚明发展起来。

当时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一批学人是最早从文化的视角审视西方的人，他们既看到中西文化可以互补，也看到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利玛窦在当时是最有影响、贡献最大的传教士。徐光启对他非常尊重，在他们共同的推动之下，一批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的书籍被翻译出来。在天文学方面有《乾坤体义》，在数学方面有《几何原本》、《同文算指》，在物理学方面有《远西奇器图说》，在水利方面有《泰西水法》，在地理学方面有《坤輿万国全图》、《海外輿图全说》、《职方外纪》，在火器方面有《则克录》（又名《火攻挈要》），等等。这些科学知识的引入，对明朝士大夫中的先进分子，起到了一种唤醒作用。特别是《崇祯历书》的纂修可谓中西学者合作的产物。此书由明政府先后任命徐光启、李天经主持历局修订，并聘龙华民、邓玉涵、汤若望、罗雅各等耶稣会会士担任历局职务，参与工作，崇祯八年完成。崇祯十六年下令通行。实际上未及通行明朝灭亡。明朝的科研成果，被清朝继承应用，一直使用到清末。利玛窦虽然未直接参与修历，但参与修历的人，无不受利玛窦的影响，故明清士人往往把《崇祯历书》视为“利氏之学”。当时中国文化也通过传教士介绍到欧洲，如利玛窦翻译的“四书”拉丁文本后来就在欧洲出版。中西文化在交流中有互相学习的一面，也有相互碰撞的一面，碰撞是差异，也是了解，这是东西方文化交汇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过程，它对东西双方来说，不是灾难，而是福音。因此，利玛窦应该如何评价，也就不言而喻了。

利玛窦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在北京去世，明神宗赐葬于阜城门外藤公栅栏。当时就有人质疑为什么要厚葬利玛窦，内阁首辅叶向高就回说，仅凭利玛窦翻译了《几何原本》，就该给他厚葬。这个说法是对利玛窦历史地位的充分肯定。

在江先生的创作中，李贽是一个重要人物。

李贽，原名载贽，号卓吾，又号温陵居士，是福建泉州晋江人。四十岁时开始接触王守仁心学，以后又拜泰州学派王艮次子王襞为

师。晚年从事著述和讲学。李贽思想闪光之处在于提出历史评价的标准应该是多元的,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不能只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他主张历史评价中的是非“无定质”、“无定论”。“无定质,则此是彼非,并育而不相害;无定论,则是此非彼,亦并行而不相悖矣。”这就是说,人们在历史认识上的不同观点可以“并存”、“并育”,从而推动认识的发展。在《藏书》中,他就按照自己的标准评价历史人物,往往是前人所未敢是,而非前人所未敢非。李贽认为学者应该言行一致,“古之圣人言必可用,用必其言,虽所言不同,然未尝有欲用而不如其言者。”根据这个标准,他把学者分为“学道”与“道学”两类,“学道,其实也”,“道学,其名也。”为此,他对当时一些言行相乖、欺天罔人的“假儒”、“假道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李贽也强调物质生活的重要性,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在他看来,人不能脱离基本的物质生活去空谈什么社会伦理和道德。我们知道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无论谈仁爱,还是谈仁政,都是讲“爱人”、“泛爱众”。他们讲的“人”,是普化了的人,是他人。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人作为“己”而受到压抑。李贽则宣扬“自私”是人的天性,“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在他看来,自私也是人类活动的一种驱动力。李贽的言论在当时确是石破天惊,但也不是个别现象,它是明代传统文化异化中的一个缩影。利玛窦与李贽的确有过接触,但不像与徐光启那样相交之深。李贽对利玛窦到中国来持欢迎态度,在他看来,利玛窦熟读中国经典,尊重中国礼仪,能用流利的中文与士人交流,“是一极标致人也”。但他也敏锐地感到利玛窦来华宣扬西学的目的是想用天主教教义取代中国的周孔之学,对此,李贽认为失之于“愚”。

江先生创作的精彩之处,就是赋予李贽与利玛窦更多的历史担当,让晚明最进步的思想家与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的文化精英直接碰触,表现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从而展示中西文化的特点及各自的精神风貌。

江先生的这个文本是创作,创作是允许虚构的。江先生是严谨

学者,他虚构的情节,又都是与历史的大背景紧紧相连。可贵的是他在文本后面还附有一份“历史本事札记”的说明。我们从说明中可以看到江先生艺术创作的过程:他是严格地从历史资料入手,把握中西方当时所处的历史大环境,精心提炼,巧妙构思,对利玛窦在华的活动进行了艺术再现。在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利玛窦,一个是历史上真实的利玛窦,一个是艺术再现后的利玛窦。两个利玛窦并行不悖,从某种意义上讲,后一个利玛窦是前一个利玛窦的升华,他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思考空间。

如果从利玛窦 1582 年来华算起,四百多年已经过去了,如今中西文化交流正在成为一种潮流,回顾利玛窦其人其事,自然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是为序。

2008 年 8 月

引

本书是何由来？

著名意大利制片家马里奥·各东尼（Mario Cotone）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来到中国，制作了电视剧《马可·波罗》及后来的获奖影片《末代皇帝》。在驻留紫禁城期间，马里奥发现四百年前也有一个意大利人曾生活于此，这人叫利玛窦，是一名天主教传教士，从罗马远渡重洋来到中国。他以尊重和理解对方为前提的方式传教，从而得以在中国播下了天主教的种子；而且因为把西方科学首次传入中国而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位最受景仰的西方人、一个现在几乎所有中国学童皆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马里奥和他的意大利制作班底感到讶异，因为在意大利，这竟是几乎无人知晓。此后，马里奥一直想把利玛窦的故事讲述给全世界。他觉得，这个故事不仅须有趣，更要在趣味之中使东西方文化有充分的展现——尤在现今这个中西交互逾益频繁的时代。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在马里奥的主持下，曾有过数次撰述有关利玛窦的电影剧本的尝试，以期拍摄一部在国际上广泛吸引受众的电影。然而在这一过程中，马里奥总感觉有更多的内涵可待发掘。我曾在马里奥门下见习，并与他保持了良好的友谊。2002年，他问我可否也对这个题材作一下尝试。当我回答“可以”的时候，并不知道这

项工作有多么艰巨。回首看来,在艰巨之余,却是一次令人着迷的文化历史之旅。

在我生活的香港,东西方文化每天都在交汇碰撞。我总会发觉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中国人如此不同,有如使用不同软件的两台电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我居于美国加州洛杉矶时,有一位哲学家朋友盛孝沛,其父盛岳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共派往莫斯科学习的“二十八个半中国布尔什维克”中的一员,当年尚健在。一天晚上,他带我去参加历史学家劳翰在家中举办的文化沙龙。劳翰三十年代毕业于北大历史系,曾先后任台湾大学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他的这次沙龙着实令我大开眼界。当晚有两个主题:一个是“追求真理,严据实证”,是为西方观念的基础;一个是“协调差异,力求和谐”,是为东方观念的根基。从此,对“求证”与“求和”这一中西差异命题的思考,我一直没有停止过。利玛窦来到中国的故事,为更深入思考这一命题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考虑到利玛窦这一题材的国际性,我们在故事叙述上采用了久经验证的“英雄旅程”式结构。这一叙事结构出自现代心理学及比较神话学家坎伯(Joseph Campbell)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把他的导师卡尔·荣格的“人类集体无意识”理论推向了指导创作之实用性。“英雄旅程”的叙事结构,影响了《星球大战》卢卡斯、《教父》哥普拉等一整代创作人至今。

据此,我们的故事不仅需要利玛窦这一主角原型,还需要一个几乎是同样重要的角色原型去衬托、彰显主角的个性和动机。这个原型是谁?

在十六世纪中叶,无论是中国或欧洲,都处于同一个历史临界点;而中西两大文明,又恰巧在这个节点上初触。利玛窦是作为当时西方文化的代表来到了中国,而从本质上看,他无疑属于所谓“文艺复兴人”。那么中国方面当时又是谁具有足够的底气与其进行这场“世纪对话”呢?基于这一考虑,我们“发现”了李贽——这个兀然站在中国历史临界点上,深具传统文化底蕴而高扬“人欲”大旗的

明末思想界领军人物。

这一“发现”必须归功于我的核心团队——John Minford 教授和我的同事陈赞明。

John Minford 是英国人，像利玛窦般有个中文名叫闵福德，他与他的导师、英国牛津大学的汉学泰斗霍克斯 (David Hawkes) 先生合作翻译了企鹅出版社经典系列中的《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全译本，此后二十余年则一直在亚洲执教。近年，他再为企鹅出版社翻译了《聊斋》全译本。他不但中西学均有专长，也对西方人生活在中国社会有充分体验。相对于闵福德的学有专长，在识见修为上，陈赞明则是杂学旁收。有他俩人的协作，我的工作更为趣味盎然。

我们先把利玛窦漫长的人生历程反反复复作了不计其数次的剪裁，嵌入“英雄旅程”的叙事模式，做出电影分场本。然后从看到什么和听到什么的实境角度切入，逐一场逐一场反复琢磨，“磨”出为数二百六十余场的电影剧本。在这编写过程中，又是易稿无算。其中，大部分用英文写作，而后翻译成中文和意大利文。我们竭尽全力使任何一个译本读起来都与原本感受相同；在捕捉四百年前那个世界的语境和特征时，我们设法让今天无论中外的人士都能产生共鸣。

一批专业人士给我提供了各方面的帮助，他们是：编剧——韩玮（中国）、Jonathan Tydal（美国）、Lawrence Gray（英国）、Robin Russin（美国）；编辑——Sally Course（英国）、闵宗泗（中国）；翻译——曾云辉（中国）、Adele Dorothy（意大利）、蓝慧心（香港）。没有他们的帮助，这一工作几无可能完成。我们也得感谢互联网。在还未有互网的时代，这种即时的国际间不同的文字交互根本就不可能。

另外，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明史专家王天有、还有巴黎利玛窦学院的耶稣会神父马可·莫桑 (Michel Masson) 给我提供了宝贵建议。在视觉叙述方面，现已故去的中国第四代导演彭宁，给我提供了不少具创意的提议。澳门文化司的徐新先生和北京民族大学的侯健老师也对剧本各稿提供了细致的反馈。

剧本定稿后，再由中国老作家萧马联同陈赞明据之改写成为现

在这个供阅读用的文本,并把我们在创作过程中所作的历史本事记录作了一番整理作为附录,供有兴趣的读者与故事比照着看。

之所以称其为文本而不以传统的文学剧本谓之,是因为其中没有多少“文学”可言;而更主要的是,我们希望可以藉这个文本作为基础,多向性地把这一题材进一步往专题片、舞台剧、而至网上平台的多媒体等不同的文化娱乐载体方向转化。

最后,谨向马里奥·各东尼致以谢意。经他发起,才有这一出版物面世。

并

谨以此书纪念利玛窦在中国逝世 400 周年。

2008 年秋·香港